

鵲齋
叢書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张岱诗文集

〔明〕张岱 / 著
夏咸淳 / 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鴻
鵠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

张岱诗文集

「明」张岱 / 著
夏咸淳 / 辑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岱诗文集 / (明) 张岱著; 夏咸淳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简体版)
ISBN 978-7-5325-8478-9

I. ①张… II. ①张… ②夏… III. ①古典诗歌—诗
集—中国—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明代 IV.
①I214.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0717 号

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简体版〕

张岱诗文集

[明] 张岱 著

夏咸淳 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7.875 插页 2 字数 353,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478-9

I · 3174 定价：6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前言

一

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石公、天孙,号陶庵、蝶庵、古剑老人、六休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绵竹,常自称“蜀人”“古剑”^[一]。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卒年诸说不一,有六十九、七十余、八十八等。温睿临南疆逸史、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皆谓“年八十八卒”,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有张岱八十八岁时所作修大善塔碑可证其说^[二];商盈越风则以为卒于九十三岁,即清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折中八十八岁、九十三岁二说,或在九十岁光景。

张岱是明清之际一位多才多艺、著述等身的文学奇才、文化巨匠。他是绝世散文家、诗人、词人、曲家,又是园林家、音乐家、书法家、收藏家、美食家,通晓天文、历法、舆地、医药、文字、音韵、经学、史学。平生于

前代博物学家最服膺晋代张华，于史学家最景仰汉代司马迁。史学是山阴张氏世传家学，自张岱高祖天复以下几代人都有志于缵述史汉伟业，“思附谈迁”，“欲追彪固”^(三)，及张岱之身竭其三十年之力，始完成明史巨著石匮书和石匮书后集。

明清易代之际，大家辈出，群星灿烂。张岱所以能够跻身其中，除了个人禀赋和家庭教养外，还因为他早年深受晚明城市繁华氛围和文化新思潮的浸润洗礼，随后便备尝国破家亡血与火的烹炼，又长期接受浙东传统学术和士习民风的影响，正是这些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这位文艺奇才、博学鸿儒，并最终使他实现了自己平生所仰慕追求的大节义、大学问、大智慧的人格理想。

二

张岱出身簪缨望族、文献世家。高祖天复、曾祖元忭、祖父汝霖皆举进士，而且学殖富赡，文章精雅，皆有著述行世。天复有鸣玉堂稿、皇舆考、广舆图考、湖广通志。元忭隆庆五年(一五七一)状元及第，官至翰林侍读，是明代理学名臣，称文章巨公，有不二斋文选、皇明大政记、读史肤评、读尚书考、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山游漫稿、槎间漫笔。汝霖有研园文集，性喜蓄书，造园亭，又好戏曲，置家养戏班。岱父耀芳精熟学业，研习四十余年，目眊精衰，犹孜孜不休，但屡试不中，仅以乡试副榜谒选，授山东兗州鲁藩长史，后摄嘉祥县令，不久便解职回乡。他也酷好园林、戏曲、音乐、收藏，且挥霍无度，暮年竟至“身无长物”^(四)，从此张

氏这支宗脉渐渐露出式微的迹象。

凭借家庭的厚业世泽，张岱的前半生是在繁华、享乐中度过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培育了这位纨绔子也是文化人的广泛兴趣爱好和诸般才艺，他坦言：“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五]吃穿玩乐，备极奢华，又样样在行，件件求精。他和许多晚明文人一样，视“岁月如花”^[六]，“生平贪恋光景”^[七]，珍惜个体生命，热爱美好人生，耽乐世俗繁华生活。对他们来说，物质享受不仅在于满足物欲需求，还包含精神愉悦，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往往交织在一起。他们懂得生活，也会生活，生活与美、与艺术乃至学问密切相关，故而吃能吃出文章、学问，玩能玩出名堂、艺术。比如饮食，张岱自诩，“越中清馋无过余者，喜啖方物”，“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日为口腹谋”^[八]。非止于满足口腹之欲，还能精细地感知各种食品色香味形之美，发为妙诗妙文，又研读古今食谱、食典之类书籍，对其祖父张汝霖饕史加以精简修订而成老饕集一书，使饮食成为一种学问。张岱嗜茶，自称“茶淫”，深知茶理，对种植、采摘、制作、保存诸事了若指掌，辨色、辨味、辨产地、辨水泉，皆精绝入微，使当时著名茶道专家南京闵汶水叹为知己：“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余年，未尝见客之赏鉴若此之精也，五十年知己，无出客右。”^[九]所著茶史与老饕集正可配对为姊妹篇。对“小摆设”即金银铜锡、玉石、竹木、陶瓷等工艺制品，也都喜爱，亲之若“故友”，收藏既富，更善鉴赏，能从珍玩奇器中发现“厚薄深浅，浓淡疏密”之艺术妙理、美学意蕴^[一〇]，并由衷

赞美制作工匠们的高超智巧。物质与文化生活的丰富体验，兴趣的广泛性与才艺的多样性，对成就像张岱这样的个性发展比较全面、创造活力旺盛的作家，具有重要意义。

“余少爱嬉游，名山恣探讨。”^[一]性耽山水，爱好旅游，这是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晚明时期，非常流行的士林风气，出现了一个跋涉山川、搜探奇险而集旅行家、地理家、文学家于一身的士人群体，王士性、徐霞客、曹学佺、谢肇淛、陈第、张燮、袁宏道、王思任等都是一代闻人。张岱之游，论足迹所至不如以上诸人广远，但有自身的特色，其游兴、游足的方向、地点主要在城市尤其是江南繁华都会，且以游玩观光为主要目的，故称“嬉游”。粗考其旅游路线，从纵向看，沿南北大运河一线城市群落中之名都大邑大都游览过，如今日浙江之绍兴、宁波、台州、杭州、嘉兴、湖州，江苏之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扬州、淮安，还有上海松江^[二]，安徽芜湖^[三]，以及山东兗州、泰安等地。其游多集中于江南都会，留居时间最长的，除故里绍兴外，当数杭州了，西湖柳洲亭一带有他祖父建造的别墅^[四]。其友王雨谦西湖梦寻序云：“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对苏州、扬州、南京、镇江等名城也曾多次作深度游。这些城市群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思潮活泼开放，那绮丽的湖光山色，丰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新奇炫目的世俗风情，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极爱繁华”的张岱，使之心醉神迷，就像着了魔似的。以至社会经过天崩地裂的大震荡大劫难，将这一切震得七零八落，花随水流之后，他还念念不忘，津津有味地咀嚼如烟往事，时常见诸梦寐，“无日不入

吾梦中”^[一五]，故其文章常写梦境，书也“率以梦名”，如梦忆、梦寻云。张岱对晚明城市文明、世俗生活和市井人物的一往情深和深切了解，是当时许多文人学士难以企及的，明乎此，也就差不多把握到张岱所独具的灵奇思致、绝妙文笔背后的“脉性”了。

张家的荣显未能延续下去，到张耀芳这一代已现衰象，举族都把重光门庭的厚望寄托在张岱这个嫡长子身上。凭他的学问文章、天赋才能，且“少工帖括”这许多优势，本以为可轻取功名，谁知竟屡试不第，年届四十犹沉沦诸生间，所遭科场厄运较其父更甚。少时“功名志急”，总想“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到头来还是铩羽泥涂。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对明季黑暗现实、腐败官场，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了清楚的认识。他痛愤天下才士多遭压抑而不获拔识，“世间珍异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一六]；痛悼亡友“具用世大才，生不逢辰，贫病相寻”，“徒阨塞终身”，“鲠咽以死”^[一七]；满怀愤世嫉俗之气，借一出乔坐衙杂剧“讥刺当局”^[一八]，把矛头直指昏愦贪腐的当朝权臣。腐朽的明王朝在农民军和后金的夹击下节节溃败，而对广大民众敲剥愈厉，以致民生凋敝。张岱已经感觉到朱明气数将尽：“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蠚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一九]他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却被抛弃，“志在补天”^[二〇]，徒成空想。将何去何从？是继续耗费生命去赌举业，还是专注于文艺与学问，追求禀性之所好？他正面临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时在四十岁前后。当友人祁彪佳向时任宁波推官的李清为他申诉科场“屈抑”，并请从中斡旋，终于无效后，张岱乃绝弃科举功名，决意不玩八股这“劳什子”了，收视反听，专心致志于自己爱好的事情。一方面，仍然盘桓

江南名都剧邑,观风俗,察人情,访胜迹,赏山水,广交名士畸人及各色市井人物,悠游于文学艺术之林;另一方面,潜心研究学问,发奋著书立说。年及五十,业已或基本完成的著述约计十余种,如古今义烈传、四书遇、史阙、奇字问、诗韵确、茶史、老饕集、评和陶集、桃源历、历书眼、皇华考、陶庵肘后方、续博物志等,修纂明史石匮书的大工程也已持续多年。其书涉及经学、舆地、历法、文字、音韵、文学、艺术、医药、饮食等多种学科,凸显了宏富博洽的杂家特色。他是博学家,也是专门家,尤邃史学,用力最勤,成绩最著。张岱前半生所取得的这些文艺与学术的成就,从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探究其因,是他接受了晚明文化新思潮的浸溉,在盛年遭遇科场失败之后,即迷途知返,摆脱了唯以科举功名为人生奋斗目标的价值观的束缚,更加注重发展个性之所好所长,沉醉于艺林学苑,敬其业而乐其事,因而有了许多创获,而后愈见辉煌。观乎晚明文化领域诸多精英大率如此。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清师大举进驻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者,明年击破南京福王小朝廷,第三年攻陷绍兴。是年张岱适逢五十岁,国既破,家亦亡,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由富贵繁华的前半生转入贫困凄凉的后半生。自为墓志铭云:“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他面临更加严峻的人生抉择和生死贵贱的考验。以他的学问文章和家庭影响,若剃发变服以事新朝,可望获取功名利禄,重振祖业,但此种行为与其素来景慕“义烈”的性格冰炭不能相容。他曾想以死殉节。目击包括自己亲朋在内的抗清义士,临难不屈,或绝食,或赴水,或投缳,

慷慨赴义的悲壮事迹，每每悲痛欲绝，觉得生不如死，梦忆序云“作自挽诗，每欲引决”，但最终没有。因为：其一，基于对朱明覆亡后时局清醒认识。清入入主中国，宣告明朝的灭亡，被拥戴的明宗室在南方建立的几个小朝廷，依然腐败，而且互相对立，一盘散沙。张岱将南明诸王譬为一团触手即碎的腐肉，“谁知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之数也”^(二一)。大势已去，天柱已折，纵有“补天”之志，也不可能挽天河于既倒了。“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二二)，“志欲补天，而天如玑璇，练石在手，则亦奚益哉？”^(二三)轻易为之殉葬，于国于民都无补益。其二，基于对节义的通达理解。他在石匮书一篇总论中这样表明自己关于生死节义的观点和遭逢明亡而不殉死的理由：“夫义者可以死、可以无死者也。可以无死，虽不死，而人不得责之以必死；可以死，能拚一死，而世界又不可少此一死，故谓之义也。余一生受义之累，家以此亡，身以此困，八口以此饥寒，一生以此贫贱，所欠者但有一死耳。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以死为无益而不死，则是不能死，而窃欲自附于能死之中，能不死而更欲超出于不能死之上。千魔万难，备受熟尝，十五年后之程婴，更难于十五年前之公孙杵臼，至正二十六年之谢枋得，更难于至正十九年之文天祥也。”^(二四)明辨生死之际，曲诉隐忍之衷，大义凛然，大哀殊深，直令彼贪生怕死，卖身求荣，“峨冠大纛者”，惭汗无地自容，亦令“以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二五)，于九原之下知有所愧。其三，基于对修纂明史石匮书的文化担当。修纂一部完整精核的明史巨著，不但是张氏三代人的家族宏愿，也是明代史学界的共同期盼，及至明

亡，更成了遗民们寄托故国之思，总结前朝盛衰兴亡历史经验的一大文化工程。张岱自觉地担当起家族和时代赋予的历史文化使命，多次表明所以遭易代沧桑之变、忍受贫困伤痛而不死，就是因为石匮书还未修成。梦忆序云：“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和挽歌辞云：“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基于上述原因，张岱没有贸然自殉以明节义，而是选择存活下来，继续未竟的事业，并始终保持坚贞的气节。这样就要承受贫困生活的煎熬和折磨，甚至突如其来政治迫害，不但是一己，还要连累全家，不是短期阵痛，而是长期受难。又叹为修石匮书所受磨难和伤痛：“古来作史无完人，穷愁淹蹇与非刑。石匮书成穷彻骨，谁肯致米周吾贫？”^[二六]

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六月，清兵临绍兴，张岱携一子一仆藏于城郊越王峰古寺中^[二七]，仅两月就暴露了身份，随即逃亡至嵊县西白山，“风雨凄然，午炊不继”，明年七月，潜至城外项里^[二八]。顺治六年（一六四九）秋，始回城中，而故宅已经废毁，田园荒芜，多属他姓，“昔有附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二九]，于是租下诸氏快园废址，“败屋残垣，稍为补葺”^[三十]，以为一家二十余口栖身之所。二十年后，快园让于儿辈，自己复迁居项里，直至终老。这四十年间，主要靠他来维持一家二十余口（后分家减为十八九口）的生计，苦苦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家庭，“攢食一老人，骨瘦如鸡肋”^[三一]，年近七旬还得干“春米”、“担粪”之类又累又脏的活儿。其生计之艰，家累之重，苦日之长，在学者文人中是很少见的，但他的精神意志没有被压垮，被摧毁，相反，穷且益坚，因而弥劲，著述更加勤奋，“傲骨尚存，忍霜耐雪”，“沉沉秋壑，夜半一灯”^[三二]。

他的几部不朽的代表作,如诗文集琅嬛文集、随笔陶庵梦忆、地理游记西湖梦寻、类书夜航船、经学四书遇、笔记快园道古等均成于此时。最令他欣慰的是,寄托着家族和时代厚望,凝结着自己近三十年心血的石匮书,在他五十八岁那年(一六五四)终于告竣,紧接着又修石匮书后集,数年后亦告成。此后仍笔耕不辍,八十四岁编成琯朗乞巧录,此书旨在弘扬智慧,启发“愚蒙”,“以济时艰”,流露了“八十四老人”的一片拳拳挚爱之心。更令人惊奇的是,以八十八岁高龄撰成修大善塔碑这篇“金声玉振”的骈文。作者借演说佛法以显越城形胜,宣讲事理人谋,表现了此老对公共事业和地方建设的关心和支持,思想的活泼,意志的坚毅,建言的精到,丰富的想像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都让人感到惊异。

“夺利争名,甘居人后;观场游戏,肯让人先?”张岱自为墓志铭如是说。受士风、师友、族人的薰染^(三),他自幼便养成喜爱戏谑谈笑的习性,至老处穷都没有改变。僦居快园二十余年,每当暑日夕阳西下,“乘凉石桥,与儿辈放言”,脱略随意,无拘无束,俨然“舞雩”之风,儿辈书之,因成快园道古。其书充斥滑稽笑谈故事,又特设“戏谑”、“笑谈”二部。成于耄耋之年的琯朗乞巧录也广收谐谈趣事,“善谑”、“吊诡”等关目专录戏谑事项。久贫没有磨去他喜谑的习性,遇有穷迫难堪之时,辄自我解嘲,一笑了之。五十八岁生辰,无米无酒,戏赋甲午初度是日饿二首,其一云:“饿亦寻常事,尤于是日奇。既无方朔米,焉得洛生醻?痛仆辞亲友,小儿剪藿葵。一贫直至此,回想反开颐。”八十二岁,家贫如故,寒斋守岁,作五律戊午除夕,句云:“烧钱钱穷鬼,醉酒蜡文心。”逢年过节,簞食瓢饮,粗米薄醻,岱也不改其乐。豁达乐观,诙谐幽默,是张岱处贫困而

不改志节,不辍笔耕,最终在品格、学问、文章诸方面达到一生光辉顶点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得享高寿的一个秘诀,其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在张岱的性格中,坚贞不屈的伦理操守与和易能乐的游戏人生得到奇妙的融合。

“弱则唾面而肯自干,强则单骑而能赴敌”,“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为柔弱人亦可”。这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为本人所作自画像。他论析历史名臣的政治品格、处世态度,特别赞赏刚柔相济、强弱兼备、宽猛并用、能屈能伸、能进能退的品性,对于不顾情势,一味逞刚使气则有讥评。他赞同司马迁关于“老子深远”的评价,认为“深远”二字“乃老子一生藏身妙用”^(三四)。批评张良年轻时使气冒险,雇力士击秦王,“误堕荆聂”刺客者流,“则其学问浅薄”;又钦佩他后来能强忍屈身,敬受道家黄石公教导,终成灭楚兴汉大事业。论及本朝名臣李贤,称其当石亨、曹吉祥奸党专横时,辅佐“刚果之主”英宗,善用“应着”、“松着”、“闲着”^(三五),而能得君之信以行善政,遂称贤相。又称李东阳在宦官刘瑾乱政肆虐时,没有辞去相位,“婉转委蛇”,乘间“保护正人”,“调停国是”,卒诛刘瑾^(三六)。张岱还称述其友沈素先为人,“弱不胜衣,见人呐呐似不能言者,及其临大事,当大难,则其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劙,三军所不能夺矣”,其子歌叙也大有父风。张岱因之感叹:“若世间之刚柔相错,与人心之强弱迭更,真有不可测识者。”^(三七)这是对友人的赞美,也是对自己的勉励。刚柔相错、强弱迭更的品格又表现为心性意志的坚毅、坚忍、坚韧,不论处境如何窘迫凶险,只要有一线希望,就顽强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张岱把这种精神力量形象地概括为“石压笋斜出”^(三八)。巨石底下

的竹笋，承受着沉重的压力，伸展的余地只在缝隙之间，它顽强地挣扎，曲折地生长，破土裂石，抽芽发笋，长成枝繁叶茂的劲竹，形成一片凌空摆舞的碧海。张岱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这种“竹笋精神”，是他汲取易理阴阳相生，儒家既崇尚节义又讲权宜，道家主张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思想元素，继承越人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恢复的地域传统文化性格，并根据对历史名臣、高人义士出处行藏的分析，加之自身生活历练的体验，进行融合提炼出来的一种韧性的处世哲学，宝贵的人生智慧。

豁达乐观的张岱六十九岁时作自撰墓志铭，并为自己找到了一块墓地，“曾营生圹于项王里鸡头山”，隐含灭秦之心，其抗清之志至死也未泯灭。又请反清志士、志同道合的友人李长祥题写墓碑，曰“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标明其人身份乃明朝遗民，一位大学问家。其墓与碑盖早已埋没于荒烟衰草之中，而其人品格、学问、文章之奇光异彩永照史册。

三

多才多艺的张岱，能诗善文，又精词曲，而以散文造诣最高，戛戛独造，巍然大家。王雨谦琅嬛文集序喻之为“文中之乌获，而后来之斗杓”。张岱论文推崇“小能统大”：“阳羨口中，吐奇不尽；邯郸枕里，变幻无穷。”^(三九)他所追求的散文美学境界，犹如小小景观建筑，能收揽大地山河，含纳巨观宏图：“瓮牖与窗棂，到眼皆图画。”“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里煮山川。”^(四〇)这种散文美学追求表现在创作实践中，便是以小寓大，

以精驭繁，于尺幅之中展现天地山川、物类群生、人生百态、世情千种，奇奇怪怪，绚烂缤纷，从而将晚明小品文“短隽”的艺术特色发挥到极致。黄裳先生于晚明乃至有明一代散文作家，特别赏识张岱及其陶庵梦忆，不吝赞美之词：“宗子散文名家，设想奇警，而笔端又能传之。明清之际，无逾此公者。”“描摩物情，曲尽其致。笔端有鬼，辄能攫人物之精灵，牵一发而动全身矣。向来作者，未见有如此才华者。”“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四一]这里主要以琅嬛文集为例，间及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探讨张岱散文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成就。

张岱取舍文章，首观有无“冰雪之气”，“余所选文，独取冰雪”^[四二]。在他看来，冰雪“能生物”，“能寿物”，人也“无不藉此冰雪之气以生”。可见，冰雪或冰雪之气是人与万物生长的依托，是一切自然生命欣欣生意的表征，美的显现，“则剑之有光铓，与山之有空翠，气之有沆瀣，月之有烟霜，竹之有苍蒨，食味之有生鲜，古铜之有青绿，玉石之有胞浆，诗之有冰雪，皆是物也”^[四三]。文学艺术作品有此气则“空灵”，无此气则“臭腐”。祁豸佳西湖梦寻序称张岱游记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亦即冰雪之气，非独游记，其他体类散文亦然。读张岱散文，总觉得在楮墨之间洋溢着一股活泼生鲜的气息，笔下各色人物、山水泉石、竹树花草、鸟兽虫鱼皆含生机妙趣。所写人物，角色繁杂，而以文坛才人与民间艺人居多，许多鲜活传神的形象构成一幅人物画像长卷，令观者驻足玩赏，久久回味不尽。一些无名之辈、市井细民经他简练之笔略加点染，即跃然纸上。他是我国古代散文家中最擅长为市井众生造像的神工妙手。又能遵循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

自见，敢言刻画，亦就物肖形而已”^(四四)，“只求不失其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也已矣”^(四五)，不虚美，不掩过，“必期酷肖其人”^(四六)。其曾祖张元忭在家族中至尊至贵，家传主要记述他“一生以忠孝为事”的至性高行，同时也以真实生动的细节记录了这位“老状元”治家苛严不近人情的一面。为其祖、其父、其诸叔立传，也都一扫为尊者讳、为亲者隐的通病。所谓“笑啼之半面”，指现实生活中的人，有笑的一面，也有啼的一面，有瑜有瑕，瑜瑕并存，集于一身，此亦人之“本面”、“真面”。张岱刻画人物已经注意到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没有概念化、脸谱化的缺点。他以千里马比喻奇人才士：“千里马善蹄啮人。盖不蹄不啮，不成其为千里马也。”^(四七)附传写三位叔父，“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乎其可传也”。有时瑕即瑜，丑即美，张岱深知其中道理，并且成功运用于创作实践。张岱笔下人物往往具有某种癖性，乃至殊癖、奇癖、怪癖，以为这是人的“深情”和“真气”的表现，因而其人便有值得可记可传之处。五异人传云：“岱尝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人者，皆无意于传，而五人之负癖若此，盖亦不得不传之者矣。作五异人传。”张岱文集中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除五异人外，还有不少奇人异士也各有各的癖好，如茶史序中闵汶水之癖于茶，鲁云谷传中主人公之癖于洁，王谑庵传中主人公之癖于谑，山民弟墓志铭中主人公之癖于收藏，祭秦一生文中主人公之癖于闲散。至于陶庵梦忆中的许多人物小记同样着眼于人的癖性，如癖于园艺的金乳生，癖于盆景

的范与兰，癖于古董的张葆生，癖于园亭歌舞的包涵所，癖于戏曲和女色的朱云崃，而祁止祥癖好尤多，“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又有“娈童癖”^[四八]。其他身怀一技一艺之长而名于世者，也都各有殊癖，对自己所好所爱一往情深，如痴如醉，因而有了某种特殊才艺、技能，成为某一领域出类拔萃的人物，如评话家柳敬亭、戏曲家彭天锡、竹刻家濮仲谦、绘画家姚简叔、园艺家金乳生等等，其所具癖性均体现了人的自我追求，人的活力、张力和创造力。这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张岱等晚明文坛精英对于人性观照的拓展和描写方法的创新。不光是人物，包括山川动植、天地万物，在张岱眼里和笔底，都是活物，有生命的，有性情的。因此，为人世间芸芸众生，为天地间万物群动传神写照，表现出自然生命的一派盎然生机，就成了他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不但散文，凡百诸艺，有了生鲜之气、冰雪之气，便有存世传世的价值。“自弹琴拨阮、蹴鞠吹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口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四九]王雨谦评语稍加解说：“生气者百凡藉以活，殆体物而不可遗也。”冰雪之气，自然生命活力之谓也，文艺家观物体物必须把握住它。

张岱品鉴人物推重智慧，智慧与节义、抱负、经济、学问是他铨衡人物的五个标的，理想中完美人格的五种要素。他赞赏“慧业文人”，并以此自许。他的散文堪称智者之文，常在不经意间忽发奇思妙想，闪现灵光智火，不时涌现出妙语隽言。机智而诙谐，是张岱散文的又一特色。机智首先指思想的灵动活泼。张岱谈道论学强调“能动能变”，尤忌“拘